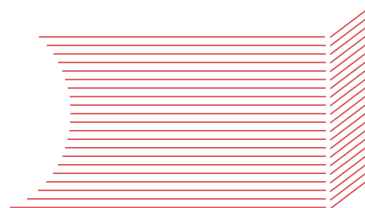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 陈 芬

平生弹力唯忠善

——吴石将军与厦大人的家国情怀

■ 林 坚



2025 年秋天，随着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在央视的热播，中共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吴石迅速进入公众视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该剧根据真实历史事件和人物原型进行艺术创作，呈现 1949-1950 年间吴石、朱枫、

陈宝仓、聂曦等隐蔽战线烈士的真实事迹。鲜为人知的是，吴石将军在上世纪 40 年代的烽火岁月中，曾经与陈嘉庚、王亚南、陈碧笙、章振乾、傅衣凌等众多厦大人物风云际会、肝胆相照，抒写了一曲充满家国情怀、令人荡

气回肠的英雄凯歌。

一、将军侨领 共纾国难

1937 年 7 月，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了全民族抗战的艰难岁月。此时，从日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海报



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已三年的吴石，因其在情报领域的重要贡献，刚刚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二处处长晋升为军令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

在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召开的会议上，吴石力主抵御日本侵略，他用数据对中日两国在国际、经济、政治、民众、武力等方面情况进行了分析对比，认为日本对我无制胜之理。“战争结局，日本必降低其国际地位，而丧失其历来掠得之属地及一切不正常之利权，是以最后胜利，定属于我中华民族。”这掷地有声的结论，反映出中国军人的铮铮铁骨与必胜信心。

战争初期，日军一路疯狂进攻。继上海沦陷、南京弃守之后，国民政府宣布迁都

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 and 军事统帅部仍在武汉。日军调集 14 个师团 30 余万人，兵分三路对武汉实行大包围。国民政府军委会召集刘斐、吴石等将领及军事专家拟定了“保卫武汉作战计划”，决定调集 130 多个师 100 余万人迎战日军。武汉会战

期间，蒋介石几乎每周都要召见吴石，咨询战况和应对办法。

武汉会战从 1938 年 6 月到 10 月，历时四个半月，是抗日战争中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长、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会战结束后，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但其战略意图受挫，被迫从“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进攻。日军由于战线大大拉长、兵力与资源不足，只好放弃“速战速决”的企图，抗日战争由此进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结束后，吴石调任桂林行营参谋处处长。在昆仑关大战和长达一年的桂南会战中，他负责收集情报、拟定作战计划，协助战区司令指挥调度，有时连续几天几夜不曾合眼，为昆仑关大捷和桂南会战的胜利付出了大量

心血。

与此同时，他凭借闽籍将领的身份，牵头创建福建旅桂同乡会并出任理事长。他以同乡会为桥梁，广泛联系闽籍人士和海外归侨，团结他们参与抗日救亡。他还帮助从海外辗转来到桂林的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到各地公演和创办黄花岗纪念学校，让闽人子弟一律免费入学。

1940 年 1 月，吴石调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并随战区长官司令部从广东韶关转移到广西柳州，驻扎在柳江南岸蟠龙山下。同年 8 月，陈嘉庚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风尘仆仆访问柳州。一位坚持抗日的将军，一位著名的爱国侨领，在这柳江之畔相遇了。

对陈嘉庚这位福建同乡和南洋侨领，吴石早已久仰大名，特别是对他坚持抗日的主张和主持南洋华侨筹赈总会的义举深为佩服。他记得，在 1938 年 10 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大会上，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从新加坡打来电报，提出议案，明确指出“敌人未退出国土之前，言和即汉奸”，一时人心振奋，提案很快获得通过。吴石得知后也击节叫好，并将这位同乡引为同道。

1938 年 10 月，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在新加坡召开，陈嘉庚被公推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大会号召全体侨胞“自



吴石戎装照



1940年陈嘉庚（前排中）率团回国慰问

今日起，充大精诚，图大团结，宏大力量，以为我政府后盾”，各尽所能，各竭所有，“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南侨总会成立一年间，分支组织发展到80多个，“对祖国战区的筹赈工作，风起云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未曾有；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在滇缅公路汽车司机和机修工极度匮乏的情况下，陈嘉庚紧急号召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数月间，各地华侨司机和机修工踊跃报名，热诚回国服务者达3200多人，

表现出海外中华儿女不怕艰苦、勇于牺牲的高尚品质。身在战区的吴石将军耳闻目睹，对这位福建同乡和华侨领袖更加充满了敬意。

1939年冬天，陈嘉庚眼见日军大举进犯，沿海重要港口相继沦陷，海外华侨不仅回国困难，就是对祖国抗战局势、民众生活和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情况也缺乏真实了解，决定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以考察战时国内状况、慰劳忠勇将士和苦难同胞。翌年3月至7月，慰劳团在陈嘉庚带领

下，先后考察了重庆、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受到当地军政长官的热情欢迎与接待。此后，陈嘉庚一行又考察了广西、湖南、广东、江西与福建。

1940年8月18日，陈嘉庚一行抵达柳州，受到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战区参谋长吴石的热情欢迎与接待，吴石与陈嘉庚一见如故。第二天，吴石等福建同乡专门举行茶会，欢迎陈嘉庚的到来。茶会中，因防空警报突响，只得临时中断，吴石邀请陈嘉庚单独到官邸一叙，



并让妻子王碧奎为客人沏上家乡的茉莉花茶。

两人在客厅一边品茗，一边亲切地交谈起来。陈嘉庚向吴石简要介绍了南洋华侨支援国内抗战的情况，并谈及前不久延安之行的印象。在对陪都重庆的奢华、虚浮和延安的俭朴、务实进行对比后，他推心置腹地对吴石说，看来民族未来的希望在延安。吴石听后一时沉默，接着他坦诚表示，国军中的一些腐败确实令人痛心，国难当头，还望嘉庚先生多费心，多联系闽侨，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多为国家分忧。陈嘉庚听了颇有同感，他对吴石说：“闽省出兵不及他省，我闽侨应多出钱，以补省内出力之不足。”谈着谈着，两颗忠诚为国、一心为民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临别时，他们紧紧握手，互道珍重。

8月20日晚，陈嘉庚一行乘火车赴桂林，吴石到车站送行，目送同乡挚友在火车汽笛中远去。蜿蜒东去的柳江水无声地见证了这对将军与侨领在抗战烽烟中结下的深情与依依不舍的身影。

二、心系乡邦 举荐英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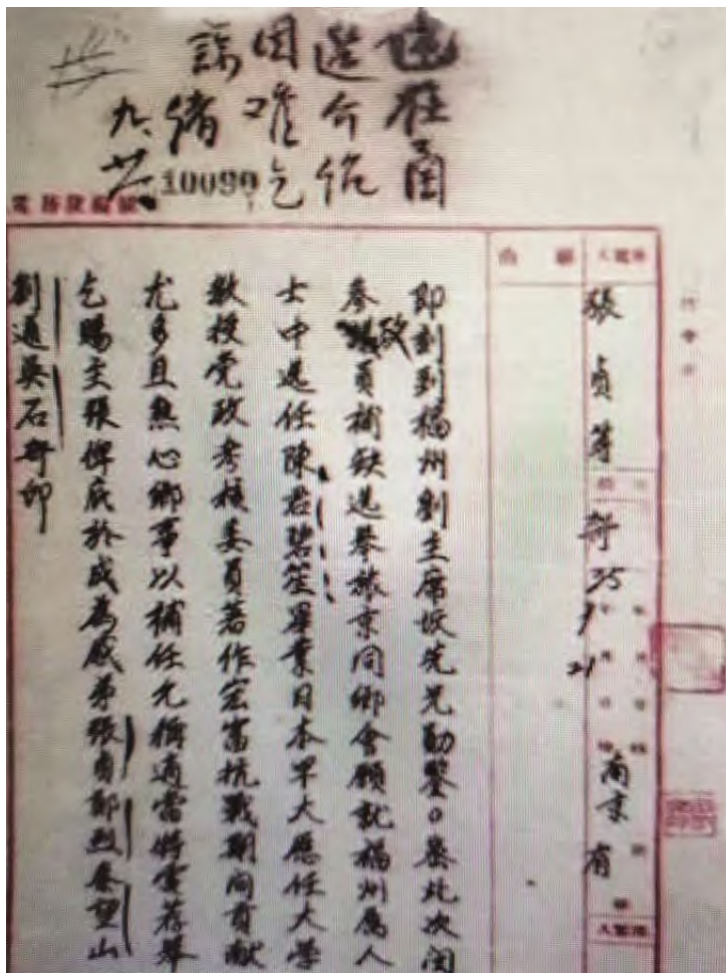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在突围中遇害。蒋介石以“整饬纲纪”为由，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要将叶挺交由军法审判。在一

片反共的喧嚣声中，吴石却冷静地对前来探望的好友吴仲禧将军（中共地下党员）说：“两党联合抗日已感力量不足，再要反共，只有降日。”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对付继续南下的日寇，而不是到处制造国共摩擦。

在张发奎、吴石等高级将领的坚持下，第四战区没有追随国民党顽固派反共，而是坚守中立、保持稳定，成为当时全国10个战区中唯一没有发表“声讨通电”的战区。作为战区参谋长，吴

石把全部精力用在军事部署上，危急时刻还亲自奔赴第一线指挥战斗。1941年5月，鉴于他“计划周详缜密，各时期战斗指挥无不合适”，国民政府授予吴石“干城甲种”一等勋章。

1942年底，为了适应战争而进一步驾驭战争，吴石策划、创办了《国防研究》月刊，几乎每一期杂志上都能看到 he 撰写的文章。当他的《新战术论》结集出版时，国民党元老李济深为其作序指出：“著者盖基于流血所得



吴石等人举荐陈碧笙给时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的函电

之经验，是有其真知灼见者，故能深入肌理，语无虚发，纵横引证，皆切实有本之言。非区于得失成败之原者，固无此精富也。”

1944年初，吴石提出以福建旅桂同乡会的名义召集座谈会，研究成立“闽台协进会”，他和张贞、庄希泉等均作为发起人。协进会常委五人，包括庄希泉、陈碧笙、周士欢、李万居和林庆年。前三人为福建籍，后两人分别为台湾籍和华侨。中共厦门儿童救亡剧团支部书记张兆汉也以《广西日报》记者的身份在桂林参加活动，开展统战工作。

1945年初豫湘桂战役后，吴石结束了在第四战区的五年军旅生活，调往重庆任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主任参事，负责处理军政事务和例行公文。豫湘桂战役的失利，让他对“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局面痛心疾首，对最高当局重用无能败将也深为不满。于是，他与“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的发起人，包括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何公敢等人有了更多的接触与互动，对他们反对独裁统治、主张民主自由、团结抗日的主张也较为认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了。吴石欣喜若狂，在中秋生日时赋诗赠友人：“八年戎马关山老，且喜收京醉菊杯。居然三剑

定天山，净扫夷尘弹指间。”同年10月，吴石被国民政府授予“忠勤勋章”。他殚精竭虑，统筹协调受降、复员、整军、建军等一系列工作，因劳顿过甚，不得不遵医嘱回家静养。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吴石也随之回到阔别9年多的金陵，出任国防部史料局（后改为史政局）局长。身居繁华古都，却耳闻目睹国民党政府独裁专政、军政长官腐败无能、接收大员“五子登科”的种种劣迹，他不禁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于是，经常与军中挚友刘斐、何遂及同乡好友刘通、王宜汉等人相聚，商讨国是，寻求救国之道。

同年9月，吴石与张贞、郑烈、秦望山、刘通等人，以福建旅京同乡会的名义，联名致电国民党福建省主席刘建绪，推荐早年曾参与福建事变的民主人士陈碧笙补任福建省政府参政员。电文称：“陈君碧笙毕业日本早大（指早稻田大学），历任大学教授、党政考核委员，著作宏富，抗战期间贡献尤多，且热心乡事，以补任尤称适当。”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不仅颇具胆识和勇气，而且彰显了吴石等人超越党派之见、唯才是举的胸怀。

陈碧笙原名陈昭涌，又名雨泉，1908年出生于福州苍霞洲一个木材商人家庭。1925年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

期间参加革命，1926年初加入中国国民党（左派党员），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军攻克福州后，他由上海回到福州，协助其堂兄、时任中共福州地委书记陈昭礼开展工作，负责筹建福州店员总工会，并担任中共福州店员支部书记。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碧笙到闽北寻找党组织未果，后流亡日本。1929年入早稻田大学政治学部读书，由于从事反日宣传，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1932年归国后到上海暨南大学经济系任教授。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亦称“闽变”），宣布反蒋抗日，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定都福州。陈碧笙出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兼福州税务局局长。“闽变”失败后，他赴云南从事滇缅铁路建设的调查与计划工作，任滇缅铁路工程局秘书兼昆明办事处主任。1943年后，他与庄希泉、张贞、吴石等组织“闽台协进会”，在桂林、柳州、重庆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45年秋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吴石与陈碧笙曾同在日本留学，在柳州时又共同参与组织活动，彼此相知，且价值理念相同，因此吴石与张贞、郑烈、秦望山、刘通等多位闽籍知名人士联名向福建省主席刘建绪举荐了陈碧笙。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陈碧笙



最后未能补任福建省政府参政员，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愈挫愈勇。1947年他赴沪组建“闽台协进会上海分会”。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他以“闽台协进会”常委身份，率领京沪两地的台湾群众团体代表前往台北调查，并将国民党当局镇压台湾民众的真相公之于众。

1948年初，吴石开始秘密参加“民联”组织的活动，并经陈铭枢、吴艺五介绍加入了“民联”。同年春夏之交，在南京、上海的福建同乡会发起拥戴吴石出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的活动。活动的幕后策划人就是吴石的学兄（保定军校一期毕业）、“民联”中央监事吴艺五。当年他担任国民党福建省军事厅参谋长时便与吴石关系密切，如今他们又走到了一起，因此他也成为吴石与中

共驻沪地下组织负责人吴克坚联系的重要桥梁。

中共地下党组织之所以要争取让吴石出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无疑是希望为和平解放福建铺平道路；而且打出“闽人治闽”的口号，地方人士也较容易接受，且不至于太暴露。后来这一活动虽然未能奏效，但也扩大了“民联”的影响，对“民联”组织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1949年春，吴石调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不久，他前往广州、香港，会见老朋友吴仲禧，并通过中共华南局直属福建特别支部书记张兆汉的联系，与中共华南局香港分局工委书记饶彰风会面，并将两份重要情报资料转交给他。这两份密件正是国民党军队在川、滇、湘、粤、闽各省的兵力布置和在西北各地的兵力和装备情况，对我军解放西南、西北大有

帮助。

而此时，厦门大学著名教授王亚南也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要他转移到香港的安排，悄然登机离开厦门，飞赴香港。他不仅为香港地下交通站带去了一张厦门城防地图，而且与中共华南局香港分局负责人潘汉年见了面，并按照党组织的意图，对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进行了策反、说服工作。

同年5月，在中共香港分局的安排下，王亚南与李达、郭大力等100多位爱国人士乘“岳州号”货轮秘密离开香港北上，奔赴已获得解放的天津、北京。与此同时，陈碧笙与设在香港的中共华南局有关部门也取得了联系，旋即北上，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亚南于1950年5月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随即南下福建，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首任校长。而此时，吴石正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台湾岛为我党从事秘密情报和策反工作。由于中共台湾工委的暴露和叛徒的出卖，吴石不幸被捕，并于当年6月10日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吴石牺牲后的第二年，陈碧笙从北京回到福州参加土改工作，后到福建学院任教，并先后担任民盟福建省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福建省政协委员。

1956年10月，在时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厦门大学



陈碧笙教授（右二）在厦大

校长王亚南的关心、协调下，陈碧笙被调到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任研究员。吴石当年举荐未能实现的愿望，经由王亚南的接续努力终于以另一种形式得到了实现。从此，陈碧笙扎根在厦门大学，先后担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台湾研究所所长、嘉庚研究室主任等职，出版了《台湾地方史》《南洋华侨史》《世界华侨华人简史》及《陈嘉庚传》（合著）、《陈嘉庚年谱》（合著）等著作，并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中央参议会常务委员。

吴石被誉为“侠肝义胆”之士，王亚南被称为是“一个懂得人的价值的经济学家”。古人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而能被这样两位“伯乐”都相中，陈碧笙教授自是“与有荣焉”。

三、齐心协力 转移“密档”

1949-1950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风云岁月中，吴石和王亚南、章振乾、傅衣凌等多位厦大人齐心协力，密切配合，使一批从日军手中缴获的军事机密档案得以完整保留，并回到人民手中。

早在抗战后期，身在陪都重庆的吴石眼见国民党内部腐败日益严重，对“党国”的信心坍塌。一次赴前线回来，他在日记里写道，“前方

将士流血，后方权贵分肥，心如刀割”。在和友人的倾心交谈中，他甚至说：“国民党不亡，没有天理。”

而此时，王亚南正在内迁粤北坪石的中山大学担任经济学系主任和教授，他对国民党的官僚政治和统制经济同样十分反感。1944年夏，日军铁蹄所向，粤北、赣南均受到了威胁。王亚南先是离开中山大学，一个多月后，应国民党福建省主席刘建绪邀请，来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出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上任之后，王亚南增聘了一批中青年研究骨干，包括章振乾、余志宏、谢怀丹、李达仁、胡国梁等，并调整研究机构，设立了三个研究组：政治组由杨潮（羊枣）任组长，经济组由章振乾任组长，文史组组长则由他自己兼任。对战时到永安从事文教活动、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如唐仲璋、傅衣凌等人，王亚南都尽力给予支持和帮助，先后将他们聘请到研究院担任研究员。

1945年7月，“羊枣事件”发生，国民党特务对永安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了大搜捕，王亚南气愤地离开社科所，前往内迁闽西长汀的厦门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他随厦大回归厦门，先后出任经济学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社科研究所也于1946年随福建省研究院迁回福州，由章振乾担任所长。

1948年秋，国民党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部分行政机关开始向台湾、广州撤退。时任参谋总长的陈诚打算将国防部史政局保存的一批军事机要档案直接撤退台北，吴石得知后提出“暂移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这一建议得到了军方同意。

同年12月，国防部史政局组成派遣小组，通过军用专列将500余箱军事机要档案自南京押送至上海，再由海上转运至福州马尾港，随即运送到城内于山，藏于戚公祠大殿，由全副武装的警卫日夜守护。

这批重要军事档案中，包括298箱由日本原驻华情报机构“末次研究所”收集的重要情报资料（即《日本“末次研究所”剪报资料》），是从1913年至1940年7月中国出版或海外输入的50多种中文、英文和日文报纸上剪辑、整理出来的（共755辑，约16万篇、2.2亿字），抗战胜利后从日军手中缴获。这些情报资料记录着当时中日关系、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和日军侵华的来龙去脉，不仅数量大、来源广，而且系统性强，还留存大量收集者的批注。军方认定其极具价值，不仅藏有重要的军事情报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而且是日军侵华的真实记录和历史见证。吴石作为著名军事情报专家，自然也深知这些情报资料的重要性。



1949年2月，吴石由南京调到福州担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随着南京、上海的相继解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国民党当局电促吴石尽快将这批机要档案运往台湾。这时，福建省研究院相关研究人员也从不同渠道得知了这批情报资料的价值与下落，于是通过“内线”主动与吴石联系。吴石与时任福建省研究院院长黄觉民恰是多年好友，经过一番认真考量和秘密商讨，吴石决定采用“调包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以“军运紧，调船难”为理由，先将100余箱军事图书和参考资料充作“绝密档案”作为第一批运往台湾，并打算将其他重要军事档案转移至位于仓山

麦园路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寄存”。

6月上旬，吴石指令绥靖公署第四处派军车和士兵抢运这批重要军事档案，福建省研究院上下齐心，给予积极配合，使这批档案资料顺利“寄存”，等待曙光的到来。8月中旬，吴石接到“总统府侍从室”从台湾发来的密电，命他迅速赴台，接任国防部次长。他将三位亲信部下召到家中，面授机宜，要他们配合黄觉民院长，妥善保管好这批绝密资料，不得有任何闪失。第二天，他乘机离榕赴台。几天后，福州解放，这批绝密资料也按照吴石的嘱咐，顺利交到了福州军管会手中。

许多年后，章振乾在回

忆往事时写道：“1949年3、4月间，当时我和文史组组长傅衣凌、政治组组长管长埔先生得知，吴石从南京运来从日本军方缴获的重要军政史料一批，有意争取把最有价值的留下。吴石的态度相当明朗。经过商量，吴石同意将《末次情报资料》以寄存的名义交给我们保管。”这段回忆清楚说明了吴石在截留《末次情报资料》（后文简称“末次资料”）中发挥的作用。

然而，这段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1月，福建省研究院有关人员向上级部门写了一份申请函，请求福州军管会将已移交的绝密档案资料“准予继

1952年，王亚南（中）与章振乾（右三）、卢嘉锡（右二）等合影

续拨归本院应用”。厦门大学创校时的总务长、“民联”发起人之一、时任福建学院院长何公敢受托将这份申请书带往北京。经过各方努力，这批宝贵的情报资料又回到了福建省研究院。

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王亚南担任厦门大学校长。接到教育部的通知后，王亚南就开始筹划学校的发展，考虑学校的师资、设备和图书资料。6月15日，他乘火车离开北京，踏上南下福建的征途。途经上海时，他向华东局领导作了汇报，并与华东局教育部商讨了将福建省研究院社科所划归厦门大学的设想，得到上级的支持。抵达福州后，他听取了福建省委领导的指示，看望了福建省研究院社科所的老同事、老部下，包括章振乾、傅衣凌、张来仪等人，福建省教育厅领导也原则同意将福建省研究院社科所的图书资料拨给厦大。

7月12日，王亚南正式出任厦门大学校长，并与厦大军管会和前任校长办理了移交手续。7月25日，厦门大学在给省教育厅的公函中指出：“本校案准华东教育部指示，以本省研究院社科所归并本大学办理”，并援引省教育厅厅长“面允将有关社会科学参考图书及资料拨归本校接收”的承诺，正式提出接收申请。7月29日，省政府在公函上批示：“社研所华教部决并于厦大，其所内

图书资料一起拨去。”此后，福建省研究院社科所的主要研究人员分批南下，加入厦门大学，原所长章振乾出任厦门大学教务长；社科所的图书资料包括“末次资料”也一起转移到厦大，傅衣凌、张来仪等学者亲身参与了这些图书资料的移交，厦大由此增添了一批新生力量和宝贵的图书资料。

王亚南和章振乾都曾在日本生活、读书过，在抗战中又饱受战争之苦，对记录着日军侵华罪证的“末次资料”自然十分重视，不仅视其为“宝物”或社科所的“嫁妆”，而且还专门成立资料科负责保管，为后续整理、研究做准备。可惜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末次资料”未能得到充分利用。1954年10月该资料科并入厦大图书馆，“末次资料”由此成为厦大图书馆的部分馆藏。此后在书架上一搁几十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

1979年起，厦大图书馆的老馆员欧声和历时15年，为“末次资料”编写出20万字的内容提要。1984年，“末次资料”被专家鉴定为“孤本珍贵文献”。1985年，来自美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多名研究者专门来厦查询、使用“末次资料”。1997年，厦大图书馆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单位协力配合，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为名，影印出版了“末

次资料”，共260册。200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末次资料”为基础，编辑、出版了《密档中的历史》系列丛书。历经岁月沧桑和多方努力，吴石当年冒险保留下来、众多厦大人接力传承守护的“密档”终于重见天日并闻名于世。

“肝胆生平如一日，功名前路各千秋。”这是吴石好友、曾任国民党福建省教育厅厅长的李黎洲在《柳州晤吴虞熏》（吴石字虞熏）一诗中的豪迈诗句，它不仅见证了两位患难之交的深情厚谊，也成为吴石与厦大人肝胆相照、风云际会的真实写照。

（作者系《王亚南传》著者）



谷文昌（右二）与白垭村村民研究
沙滩种树



吴石戎装照